

长期以来,天津历史文化研究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两种程式化的叙事窠臼。一种是囿于以明代永乐年间设卫筑城为起点的六百年城市史,一种是聚焦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近代百年风云史。漕运的帆影、租界的洋楼、老城的市井,成为人们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印记,却也让天津的历史叙事框定在“唯明清近代论”“唯中心城区论”的窄巷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白俊峰的新著《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打破了这种认知藩篱。作者秉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以考古学的实证功底、艺术史的敏锐视角、社会学的宏大视野,通过四篇环环相扣、层层累进的文章,在城与山的对望、河与林的交融中,按照点、线、块、面的逻辑重构天津历史文化的叙事体系,也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例。

破局:三个维度的叙事框架

地域文化研究之难,往往在于很容易陷入画地为牢的线性叙事与行政边界的思维桎梏,这也导致天津历史研究很难跳出“金代直沽寨—元代天津镇—明代天津卫”的单线进程逻辑,把城市的文化视野局限在中心城区行政管辖的方寸之地。本书开篇《认识天津历史文化的三个维度》,便直面这个逻辑短板与认知误区,以梁启超“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整体史观出发,提出“全国、全域、全时”的三维认知框架,架构起探究天津历史文化的时空坐标系。

在全国维度上,作者跳出“一城一域”的自说自话,将天津历史置于中华文明发展与南北文化交融的大格局中审视,揭示出天津从来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而是始终深度参与中华文明的演进,由此摆脱了“就津论津”的局限,让天津的文化特质与历史价值在全国层面找到更清晰的定位。在全域维度上,作者厘清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的区别和联系,认为用现行行政区划强行框定历史文化边界,既不科学,也极易陷入狭隘的地域陷阱。判断一个历史主体是否属于地域文化,核心不在籍贯,而在其对本土文化的“在地性”贡献。在全时维度上,作者依托天津考古界数十年丰硕成果,用考古实证地域历史不是被人剪裁的孤立片段,而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借用生态学概念提出天津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边缘效应”特征,认为天津地处农耕与游牧、中原与塞外、海洋与内陆的交汇点,并由此对苏秉琦“用边角下料做时装”的妙论做了新的诠释。作者认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使得天津将四方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文化基因。这不仅是对天津城市性格的形象揭示,更为理解中国北方“边缘地带”的文化演进提供了新视角。

心史:一幅画卷与一座城三百年的共振

与传统地域文化研究“见史不见人”的叙事不同,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始终将“人”置于历史的核心,让沉默的文物、文献与遗址,开口讲述被时代遮蔽的个体命运和群体心境。书中收入的《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一文,以天津博物馆馆藏《秋庄夜雨读书图》为切入点,开启一场精彩的“透物见人”的学术探索。

这幅向来被视作“盐商园林豪奢写照”的长卷,通过作者对题跋等“副文本”的爬梳,结合当时的社会处境,揭示出清代天津盐商群体隐秘的心史。画中描绘的“莽苍萧瑟夜雨意”,绝不是对水西庄园林盛景的炫耀,而是第二代盐商查礼在科举屡屡失意之下的“读书明志之托”,更是其试图摆脱“四民之末”的阶层桎梏,实现“由商到仕”身份转型的内心独白。题跋者对查礼小心翼翼的抚慰,更让我们看到盐商群体在财富积累背后强烈的身份焦虑与精神诉求。更具学术价值的是,作者以此画为线索,梳理出清代天津本土高雅文化“创造—认同—追忆”的完整过程。从清乾隆年间水西庄“南人北上”的文化勃兴,到嘉道年间梅成栋通过《津门诗钞》完成对盐商文人身份的确认,再到民国严修父子通过对画作的临摹和水西庄遗址的保护,一幅画串联起清代三百年的文化变迁。这种以艺术品为核心的社会史解读,切入之巧妙、解读之精彩,令人耳目一新,让冰冷的历史文献拥有了人的温度与情感。

塑形:一座山林与两个“遗产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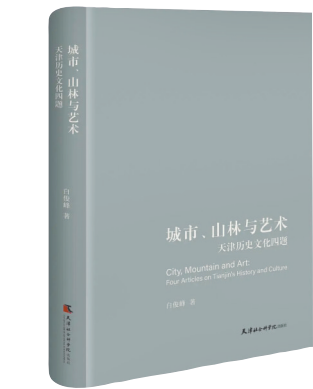
如果说对《秋庄夜雨读书图》的解读,是在城市的烟火中读懂了“人”,那么,对盘山的系统梳理则是在山林的寂静中还原了历史的面貌与厚度。在《塑造山林:盘山历史文化述要》一文中,作者跳出传统山志“名胜罗列”的书写模式,创造性地将盘山文化遗产划分为“实体”与“文本”两类。前者是散落山林的寺院、佛塔、造像、碑刻,与自然景观共生;后者是史志、诗文、图像,记录并塑造了盘山的文化

本版责编:冯朝晖 丁淑娇 张 宸

涪水盘岳之间,重绘津门文化长卷

——读《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

邵波



面貌。它们既统一于山林这个物理空间,又各具特色,共同构成盘山厚重的文化底蕴。

基于这一分类,作者清晰地勾勒出盘山人文史的两次重大转型。唐辽时期盘山从自然之山转向佛教名胜,千佛寺552尊线刻佛像像不仅是辽代燕云地区佛教艺术的巅峰呈现,更是观察中国北方佛教文化传承与演变的重要样本。清代前中期,盘山从佛教名胜转向人文名胜,乾隆通过兴建行宫、重修寺院,敕修山志、命名景观、图绘胜景、题诗留刻,对盘山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统塑造。作者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焦虑”理论,分析乾隆对智朴《盘山志》的尖锐批评,认为这绝非简单的学术正误之争,而是一个强势“塑造者”试图拿回山林“解释权”的文化博弈。在对盘山“文化生态”的探讨中,作者指出盘山人文史是一部记忆史,其间包含着古人对记忆的建构、改造和误读。作者还分析了天工与人力对盘山人文史的影响,认为这两个因素呈正向互动时,便是盘山人文鼎盛之时;民国社会动荡、寺院荒败,但文人游山却创造了媲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本遗产。这种此消彼长的“逆向互动”,恰恰映射出当时快速裂变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社会心态。这种通过多学科融合对一座山林进行整体观察的理念,可以为同类型研究提供借鉴。

辩证:一座寺院的历史与误读

书中最后一篇文章《记忆的建构、改造与误读》,以考古出土文物、碑刻拓本、佛教文献、山志史料、民国影像为基础,借用尹吉男关于知识生成的观点,对北少林寺数百年来的一些误读进行了正本清源与实证祛魅,体现了“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史学品格,以及对历史记忆生成机制的深刻洞察和反思。作者不仅厘清了盘山北少林寺“法兴寺—栖云观—法兴寺—北少林寺”的完整历史演变脉络,更系统梳理了从清代智朴《盘山志》开始的误读谱系。作者指出,从智朴《盘山志》对干文纪年的错抄,到乾隆方叙事对嵩山少林寺的刻意附会,再到后世文献对误读的性情承袭,最终演化为广为流传的“魏晋始建、天津最早、嵩山下院”。

对于这份“误读的谱系”,作者没有以真理在握的姿态简单否定前人,反而对智朴充满“了解之同情”——倘若没有这位清代僧人的山志,今人将更加茫然。更重要的是,作者未止步于史实辨伪,而是对“历史知识生成机制”进行了反思,指出“误读可看作历史的一个向度”。误读虽有悖于史实,但其生成、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却是真实的历史。在作者看来,历史书写从来不是客观事实的复刻。这种思辨,让地域文化研究摆脱“史实搬运工”的局限,从单纯的史料考据上升到对历史记忆、历史书写、历史认知的深层阐释,也让这部著作拥有了超越地域史范畴的学术深度。

余论:以一地之史感知文明之脉

作者在书中提到:“地域问题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问题本身的地域性是观察视角带来的,对问题的讨论则永远是开放的。”诚如作者所言,该书虽然以天津为观察基点,却摆脱了行政边界与历史成见的束缚。比如作者对清代天津高雅文化“创造—认同—追忆”历程的总结,可为天津之外的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类似模式化的启发。地域文化研究,一方面要扎进泥土中,读懂一方水土的独特肌理,另一方面也要跳出地域桎梏,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脉络中找到定位。

总之,《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是近年来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收获,是一部兼具理论高度、实证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佳作,其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值得学界关注。它以考古材料为根基,以艺术史为视角,以多学科融合为方法,突破了地域文化研究的诸多定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在破解千城一面问题的当下,唯有读懂城市的历史演进,才能守护好它的文化灵魂;唯有在中华文明的伟大发展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才能拥有真正的自信。也许,这正是该书带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启示。

(作者单位:天津市文物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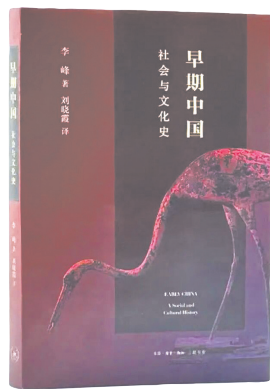
《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

作者:白俊峰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超长时段下的古代社会构建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读后

李彬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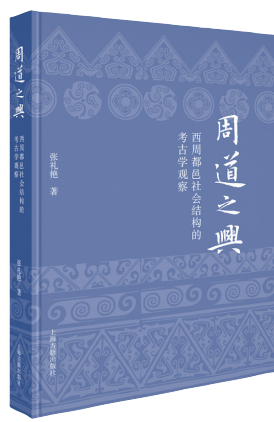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的发展过程,是考古学、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早期中国这一概念多流行于海外汉学界,指的是从史前到汉代超长时段内的中国历史阶段。在中国学界,因研究方法不同,通常是以夏商周三代作为划分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标志,将三代以前归为新石器时代,将文献较少且介于有无文字之间的阶段称之为原史阶段(或称先秦)。从文字资料出发来重构古史,三代至汉代主要依靠综合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等来构建,而三代以前基本就只能依赖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因此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通常将研究方向划分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或高周考古、西周考古。研究方法的不同或是划分为不同研究时段的原因。

也正是基于此,过细的研究时段划分出若干研究方向,也就使得从史前到秦汉数千年的长时段建构研究并不多见。如何将长时段内不同发展阶段有效串联,同时还能从史前时代的无字考古遗存、原史时期的多种文字、文献等不同属性的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运用到社会构建中去,都是不小的“挑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李峰这本《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便值得推介。其实国内对作者应该并不陌生,早在多年前就分别出版过《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2010年)和《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2016年),引起过反响。作者在中国西北大学和社科院考古所完成本硕训

作者心语

从考古学视角重构西周社会历史进程

张礼艳



方面主要包括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社会分工,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等问题。

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墓葬材料入手分别对三个都邑的族群构成进行分析。除墓葬材料以外,周原地区历年出土的青铜器多带有铭文,提供了人群来源的信息。朱凤瀚、刘士义、曹玮、辛恰华、刘宏岐等诸位学者分别根据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铭文分析过西周贵族家族情况。以往研究中关于西周都邑社会分层的探讨,多是从墓葬资料入手,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都邑展开分析。三个西周都邑在最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陆续发现一系列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存。周原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有相当一部分为殷遗民。雷兴山提出周原遗址部分西周时期手工业作坊区内的居址遗存和墓葬的主人属于同一个特定的人群,可能为专职的手工业者。孙勇勇提出西周时期贵族或王室拥有的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包括平民、奴隶、作坊的管理者及小贵族等,部分生产者可能属于殷遗民。林森提出周原遗址齐家制铜作坊、云塘制铜作坊、庄李铸铜作坊、洛阳北窑铸铜遗址的手工业者主体均为殷遗民。付仲杨指出丰镐遗址的制铜作坊由某些贵族具体负责骨器的生产和管理。付仲杨、徐良高提出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西周墓葬的墓主由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底层陶工等构成,墓葬中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以往学者关注过西周都邑基层社会组织,朱凤瀚提出西周时期存在不同姓的诸多宗族族长担任世官的制度;林沄提出“百姓”的古义是“百官族姓”,“世官”源于不同的氏族或宗族以世代相传的特殊技能服务于社会,“百姓”即为担任世官的不同姓的族长;林森提出西周基层地域组织的实现方式是“里”和“师”;张天恩从聚落布局的角度探讨周原遗址的主要功能区;王祁认为“里君”管理“里”,“百姓”是“里”中居民,里组织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控制殷遗民。

综观以往研究,均是利用考古遗存探讨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手工业生产是与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相关联的问题。

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对于构建西周社会史意义非凡,能够解决传世文献无法解决的问题。本书综合利用目前所见的考古学资料,包括墓葬、青铜器窖藏、青铜器铭文、建筑遗存、手工业遗存、车马坑、马坑等各类遗存,考察西周都邑的社会结构。然而,正如罗素所言,“在讨论社会结构这种抽象概念时,根据的不是文献资料,观念上的距离就会显得尤其大。为了将考古材料与广泛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演绎链条的建立就必须非常谨慎”。本书根据墓葬特征和青铜器铭文分析西周都邑的族群构成,以墓葬、车马坑、马坑、建筑遗存的等级差异探讨社会分层,利用生产工具、生产场所和产品分析社会生产,从聚落功能区的角度讨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均是

将考古材料与历史问题相联系。囿于考古材料反映历史信息的局限,本书在论证过程中尽量弥合二者之间的距离,利用多类不同材料形成互证,除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外,青铜器铭文和相关文献资料也综合使用。本书讨论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四个方面看似独立,具体到西周都邑的社会实际中,四者实则相互交织,共同反映出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商人逐渐融入西周社会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周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商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西周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商人群及其所承载的商文化是西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文明正是以其包容的文化特性铸就出融合发展的商周文化共同体。以包容为底色,正是周道之兴的由来。

本书旨在突破西周都邑考古以往的研究视角,尝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切入,将西周都邑的考古学研究向前推进,发挥考古学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考古学研究中,新资料的发现和积累固然重要,已有考古资料的系统阐释同样不容忽视,唯此方能实现考古学促进历史理解的学科目标。

自2015年将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以来,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氛围的熏陶,我时常思考: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所得出的结论如何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在基础研究以外,考古学还能如何揭示历史贡献?考古出土的零散、多样的实物资料,串联在一起,会勾勒出怎样的历史画面?基于这些思考,我于2017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最初目的是想对西周都邑目前发现的各类遗存进行系统整合,综合考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人如何在都城地区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殷遗民,共同推动西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

立项之后,我很快意识到使用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并非易事。融会贯通各类考古材料,将之与历史问题相联系,更需严谨对待。本书在《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各类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希望以此为个案,更大程度发挥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在揭示历史原貌中的作用。从个人学术经历来看,考古学基于陶器类型学分析所做的分期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起点,但考古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远不止于此,仍有更多的历史现象和线索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去发现和解释。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前言,有删减)

题需要通过方法与材料来解决,可以说方法即问题,问题即方法。正如序言中所说,作者始终遵循比较的视野,希望把中国放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同时他更关注Why and How,即为为什么和怎么样,而不仅仅是What and When,Where,是什么、在何时以及在何地其实很容易回答。

从研究概念出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又分为两个层次,其中包括大的研究概念,如早期农业社会、早期复杂社会、早期国家、领土国家、早期帝国等,是对一定时期内考古材料的整体认识,可以看到的是农业系统建立后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还有小的研究概念,即论证具体材料时运用。如在史前阶段注意“早期书写”,认为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零星符号资料是文字的雏形。当然,专业研究者可能最关心的是,面对无文字或有一定文字记录的古代社会该如何探究的问题,作者在研究社会层面时除了采用国家概念外,还引入政治格局和区域网络的理论,将安阳殷墟与同时代其他地区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看待。同时,书中紧扣书写系统成为维系政治运转、社会组织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这一思路逻辑,从书写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来透视商代上层政体,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综上,这本书在超长时段下给我们呈现了精彩论述,融合了理论、方法与材料,让我们从传统角度解读考古材料之余看到新意。所以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先秦史学者,抑或是对此内容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都能从中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史时应关注海外汉学家在中国历史时的“他者”视角。我们应该注意他们使用的方法,关注材料的不同属性与侧面,甚至是基于相同材料得出的不同认识,这些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当然这也是我们通过此书可以看到的。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作者:[美]李峰
译者:刘晓霞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张礼艳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本书旨在突破西周都邑考古以往的研究视角,尝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切入,将西周都邑的考古学研究向前推进,发挥考古学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考古学研究中,新资料的发现和积累固然重要,已有考古资料的系统阐释同样不容忽视,唯此方能实现考古学促进历史理解的学科目标。

自2015年将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以来,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氛围的熏陶,我时常思考: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所得出的结论如何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在基础研究以外,考古学还能如何揭示历史贡献?考古出土的零散、多样的实物资料,串联在一起,会勾勒出怎样的历史画面?基于这些思考,我于2017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最初目的是想对西周都邑目前发现的各类遗存进行系统整合,综合考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人如何在都城地区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殷遗民,共同推动西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

立项之后,我很快意识到使用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并非易事。融会贯通各类考古材料,将之与历史问题相联系,更需严谨对待。本书在《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各类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希望以此为个案,更大程度发挥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在揭示历史原貌中的作用。从个人学术经历来看,考古学基于陶器类型学分析所做的分期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起点,但考古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远不止于此,仍有更多的历史现象和线索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去发现和解释。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前言,有删减)

《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张礼艳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